



审美之度 史识之维

——武大·哈佛“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” 国际高端学术论坛综述

张 园

2012年12月8—9日,武大·哈佛“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”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武汉大学召开。本次论坛由武汉大学文学院、哈佛大学东亚系和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主办,会议汇聚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、杜克大学、加州大学、法国巴黎七大、台湾中正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、《文学评论》杂志社、北京大学等院校的50余位著名学者。海内外学者向大会提交论文共54篇,近50万字。

大会的主题发言和分组报告阶段,由严家炎、王德威(美国)、陈平原、杨义、范伯群、关爱和、陆建德、罗鹏 Carlos Rojas(美国)、陈国球(香港)、易竹贤、孙党伯、陈美兰、於可训、林春城(韩国)等教授分别就回顾、拓展与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、文学观念等,提出了对文学史的写作定位、对象、格局、价值和矛盾,以及与世界文学史关系等问题的反思。

论坛最后进行了分组自由讨论,涉及以下共同主题:

(一) 文学史的“时间与空间”书写

“时间与空间”,是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框架,更是对文学与历史边界设定在国际化语境变迁中的新思考。王德威教授(美国哈佛大学)的《没有晚清,何来五四》一文曾在学界引发关于“现代文学”起点的热烈辩论,他此次进一步补充说,文学史的时间缘起是一个需要被不断解构的观念,其缘起不必定于一尊,这恰符合现代性、当下性对于“现代”的敏锐思考。

关于文学史书写的“空间”定位与边限问题,严家炎教授(北京大学)指出国别文学史应有作家身分与国籍的限定,而王德威、张业松(复旦大学)等学者则认为,作家人籍身分的限定,可能会与中华民族、政治、历史、地域等多重因素产生复杂纠葛而难于操作。当下许多非中国国籍华语写作者及其国际化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,必将挑战传统的国别文学史观。

关于文学史空间设定的观念差异问题,王德威辨析了当前涉及这一问题的两个概念:“海外华文文学”与“华语语系文学”。华语语系文学的支持者认为,“华文文学”是过去以中国大陆文学为坐标,延伸向海外,强调内与外,主与从的文学史的归类方式。而“华语语系文学”(sinophone),强调一种后殖民立场,即在目前的世界华语创作语境下,中国大陆以外的各个地区的华人社群的创作。它强调世界不同社群的华人有其创作自为自主的视野,自我独立的发言立场。王德威认为,后一观念某种意义上延伸了冷战时期的中国与非中国、中国与海外的对立方式;而实际上,“华语语系文学”是个正在延伸的概念,它甚至可以让“众声喧哗”的文学关系推广到国内语境中来,即向大陆不同的地域、民族扩展。他同时以自己正在撰写的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,说明了他关于文学史时空处理的方式和构想。

关于“少数民族文学”的文学史书写,涉及其概念命名、与汉语写作关系等课题。杨义教授(中国社科院)指出,由于历史上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差异性,其文学形成了多层面的特质,如深度中华化写作的民族作家,以汉语描写草原文化的少数民族作家,母语写作的维蒙作家等。吴漠汀 Martin Woesler(德国慕尼黑应用语言大学)、罗鹏 Carlos Rojas(美国杜克大学)等海外汉学研究者则以阿来的创作、韩国古籍中的汉语写作为例,说明了作家的民族身分与写作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。

针对文学史在空间处理问题上的得失、取舍、亲疏,也有代表指出文学史写作的权力意识问题。有学者进一步追问,我们的文学研究为何热衷写史?范伯群教授做了一个风趣而警辟的比喻。他说,中华民族、中国人历来重视史,文学史如同家族之立祠堂,作家作品入史如同立牌位,因而大家争相作史、入

史。这一观点,看似轻松诙谐,但本质上切入了文学史究竟在何种阶层、位置上定位的焦点,触及了文学史写作的潜在历史、文化心理问题。

陈平原教授(北京大学)最后针对入史作品的价值判断问题和文学入史的扩容问题,从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一是文学史与史学研究的关系。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应有古典文学、史学的训练,文学史研究应重视发掘史料对于文学史发展的作用。二是文学史写作的扩容问题。他认为文学史写作过分包容、扩散,也可能成为面目模糊、大而不当的文学史,包容更可能产生平庸化,力求面面俱到也许各面都只是点到即止,不能凸显文学史作为一家之言的特征。他提倡化复杂为简单,从“包容”转向独断,大集体作业回归千里走单骑,先做个人之钻研,始有个性化、深度化之成就。三是文学史编撰与文学教育问题。陈平原教授指出,文学史著述基本是学院派思路,是随西式教育而兴起的文化需求,也为教育体制所支持。而中国的文学教育在配合国家意识形态、发展学科建制等前提之下,建立以“文学史”为中心的教学体系,忽视了传统中国文学教育基本方式的“读本”教育,这一倾向在教学实践中导致学生重记忆轻感受,重教科书轻原著。因此,他呼吁,文学教育之重是从“重写文学史”转向重建以“读本”为中心的“文学课堂”。

(二) 文学史写作的“体例与方法”

陆建德教授(中国社科院)提出了两个话题,一是世界文学史写作观念的新变,二是文学性究竟怎么定义。首先,他认为当今西方文学史书写产生了重要的形态变化,如新的美国文学史不再限定于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,而转向关注美国文化的不同侧面,这进一步修正了文学的观念——将过去的书面文字扩展为影视的、视觉的表达,从而视野更广,文学研究进而演进为文化研究;新的文学史,形式上不再强调完整连贯的叙述,而更多是单篇文章的汇集,百科全书式的词条写作,格局更加散化。体例方法变化之外,当下的文学史日益缺少对于作家作品价值高下的判断,而显现为一种表面上平等、民主、多元和宽容的文学价值观。陆建德教授由此提出质疑,在此语境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应如何写?是否总受外部流行潮流影响?是否有价值判断的必要?同时,他还提出如何认识“文学性”的问题。是否存在一个公认的“文学性”的概念?它究竟是永远不变的还是被不断建构的?审美性是否也存在需要历史化(historicize)和背景化(contextualize)的问题?

针对文学研究逐渐向文化研究泛化的趋势,赵稀方教授(中国社科院)也提出,后现代主义、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已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区别打破,认为两者同样存在虚构性。那么,如果将两者等同,文学经典的审美性和历史性的矛盾该如何处理?经典文学中的人类性、人文主义的内涵,与一般的文学书写和历史材料的差别怎么处理?另一方面,在文化研究的转折点上,我们对“文学”的传统观念,本来与现在西方文学史研究杂化、泛化的观念相一致,后才被近代西方的文学概念界定所驯化,这本身既是启示也是悖论。

同时,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仍受启蒙话语、现代性价值及国家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观念的影响。於可训教授(武汉大学)指出,1949年之后的文学史教材编写经过了统编到指编,再到个编的三个发展阶段,他结合自己《中国当代文学概论》多次再版和修订的情况,介绍了作为高校教材的文学史编撰过程。夏中义教授(华东师范大学)以王瑶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为例,分析了文学史的体例方法如何缘起,受限于何种文学史观念等等。20世纪80年代之后“20世纪文学史观”、“重写文学史”讨论等思潮变迁,都是文学史写作要区别于政治、历史,确立自身独立的要求的反映。

(三) 文学史写作的历史体验与文化思考

第三小组以样板戏研究和20世纪50—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的历史体验为讨论起点,从文学本体研究跨越到文化思考,交锋热烈,论辩深入。江宝钗教授(台湾中正大学)就海峡两岸读本教育和文学史教育的共性和差异进行了分析,同时提出,网络信息时代中文学史式的知识记忆培养是否还重要?许多学者也根据各自的教学经验,指出文学史教育因应试体制而发生了偏差。李松(武汉大学)以“政治美学”为切入点,提出样板戏研究的方法和观点,激起众多学者的共同关注。俞兆平(厦门大学)、杨剑龙(上海师范大学)、李宗刚(山东师范大学)、吕切(武汉大学)教授等分别发表看法,从新左派思潮、历史体验性、纯文本分析等角度,表达了对去历史化的文本研究的批判。不同代际研究者的对话引起反思:在我们与文学、政治、美学的关系上,我们对待文本及其作者、演出现场,接受者等,应站在什么立场,文学史应如何回应这些?接着,李怡(北京师范大学)等学者还与参会的80、90后研究生一起,就不同代际的青年对于历史的认知、记忆和理解,进行了充分交流。如李怡教授所言,跨代际的历史体验的讨论,正回应了新的文学史观关于泛文化性、重历史性的转向。

显然,本次论坛所涉及的热点和难题,主要包括文学史书写的几个重要课题:首先,以“史识”为核心的文学史历史研究,应注重凸显价值判断和文学审美性批评;其次,西方文学史的写作理念和语境变化,泛文化研究、历史碎片化书写,对中国文学史书写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启示;最后,文学教育和历史著述、美感体验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、对话关系,文学史写作面临文学教育偏失的新课题。